



费尔巴哈 的哲学

马·彼·巴斯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費 尔 巴 哈 的 哲 学

馬·彼·巴斯金著

涂 紀 亮 譯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М. И. Баскин

ФИЛОСОФИЯ Л. ФЕЙЕРБАХА

(Лекция, прочитанная на философ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7 г.

本书根据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译出

费尔巴哈的哲学

周·彼·巴斯金著

涂纪亮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5/8 字数50,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2074 · 205

定 价：(八)0.22元

封面设计：赵 曙

目 录

一	19 世紀上半期德国的历史发展条件	1
二	費尔巴哈哲学的思想渊源	7
三	費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批判	22
四	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特点	43
五	費尔巴哈在社会生活观点方面的唯心主义	56
六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論費尔巴哈	67

一 19世紀上半期德国的历史发展条件

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維希·費尔巴哈生活在德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生于1804年,三年之后締結了所謂提尔西特和約,列宁关于这个和約曾写道:“提尔西特和約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变。”^①在同一年里,普魯士开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在1807年10月还通过了关于廢除农民的农奴身份的决议。誠然,实际上农村中几乎沒有任何改变,但是,当局公开出来反对封建殘余这一事实本身,証明了德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势力的失利。

1810年10月27日,普魯士首相哈尔登堡頒布了国家財政敕令,在这个敕令中以公告的形式宣布了全体德国公民在财务上的“平等”,其中包括在繳納土地稅方面的平等。尽管这个敕令也沒有廢除大部分封建特权,但它畢竟再一次証明必須用資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等級制度。

1810年11月8日頒布了雇工法令,1811年9月14日又頒布了調整法令,作为对雇工法令的补充。根据这些法令,世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頁。

代占用份地的农民被免除了一切租赋，并被宣布为本人产业的自由的占有者。但这里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农民必须把自己的土地的三分之一交给地主。可见，即使这些妥协性的法令也证明了普鲁士——更不用说其他德意志国家了——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

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这个时期，归根到底是准备和直接实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极其深刻地写道：“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变革的重要经济前提，这个同盟包括18个德意志国家，拥有425,150方公里土地和2,350万人口。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为德国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后来为资本主义的德国所必需的政治统一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德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开始有了巨大的发展。第一批铁路兴建起来了。德国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在各个德意志公国中起领导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504页。

用。随着资产阶级的發展，它的对手——无产阶级也发展起来了。

青年恩格斯在“烏培河谷来信”中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德国工人在工厂中的艰苦的经济状况。他写道：“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①

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一著作中，恩格斯把1836—1852年这个时期看作是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他指出德国工人已经意识到阶级团结的必要性。恩格斯把德国无产阶级比作一个威力与日俱增的大力士，并且指出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已经預見到德国工人的胜利。

1844年6月，德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即爆发了西里西亚紡织工人的革命起义。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转折时期来到了。农民也开始起来公开反对封建主。由于德国在1845—1846年遭到了歉收，农民的不满情绪便更加增长了。

1848年，德国爆发了革命。在为时两天的柏林起义中，普魯士军队遭到了失敗。

1905年9月，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了“我国自由资产者要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列宁这样評述了德国革命：“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的起义，甚至出現了一些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些起义沒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8頁。

有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成功的一次是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但是这次起义的结局没有推翻王权，只是迫使保持政权的国王作了些让步，国王在局部失败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又夺回了所有的让步。”①

尽管德国革命具有这一切缺点，尽管它一再失败，但它毕竟表明，在德国，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时代。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如此需要的德国统一在很久以后才得到实现，而且这次统一不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而是从上面，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来实现的。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宣布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列宁在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这一著作中写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很软弱，因此，没有能够阻止地主和资产阶级违反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力地痛斥了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1849年革命中以及在以后时期中的叛变行为。诚然，在德国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些激进的民主分子，他们力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封建制度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德国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怯懦地跪倒在他们的君主面前，非常畏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但是，无论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或者是容克地主，都没有能够用血腥的镇压阻挡

①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7—218页。

住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德国的资本主义愈发展，德国的工人也就在政治上愈加活跃，愈加有觉悟。德国的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活到1872年，当时德国已经展开了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思想已经深入到德国先进工人的意识中。1870年，费尔巴哈自己也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在费尔巴哈的墓上，社会民主党正式派了代表去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还直接引用了这位杰出哲学家的挚友马克思、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话。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生活道路是与这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相联系的，这位德国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出色地反映了这些事件。

如果认为费尔巴哈在晚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事实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不正确了。跟形形色色的捏造者的论断相反，费尔巴哈自始至终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按阶级性来说，他是德国资产阶级中间最激进的民主集团的情绪的表达者。费尔巴哈任何时候也没有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情心更进一步。在19世纪上半期的环境里，他是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而著名于世的，他痛恨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专制政治和等级特权，真诚地赞成建立新的德国。

费尔巴哈是他那个时代的真正儿子。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对神学和唯心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费尔巴哈留下了大批遗著。

1828年，他写了学位论文“论统一的、普遍的和无限的理

性”。这篇論文是獻給黑格尔的，是本着唯心主义精神写成的。

1830年，費尔巴哈的著作“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問世。在这篇被德国当局沒收的著作中，他批判了对人的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

1833年，費尔巴哈的杰出的哲学史著作“从培根到斯宾諾莎的新哲学史”問世。

1834年，費尔巴哈发表了哲学格言集“作家和人”。

1837年，費尔巴哈发表了哲学史論文“論萊布尼茨”。

1838年，費尔巴哈的著作“論比埃尔·培尔”发表。

1839年，发表了費尔巴哈的著作“論哲学和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批判”。

1841年，出版了費尔巴哈的主要著作之一“基督教的本质”。

1842年，他写成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1843年，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

1845年，出版了費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

1857年，費尔巴哈的著作“神譜”問世。

在1846—1866年这段时期，費尔巴哈写成了“从人类学观点論不死問題”一书。

最后，在1863—1866年间，費尔巴哈写成了“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这部著作。

在1867—1869年间，費尔巴哈的論文“幸福論”写成。

以上所列远远不是这位杰出的德国哲学家的著作的全部目录。

二 費尔巴哈哲学的思想淵源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誕生在巴伐利亞一位著名的刑法學家安瑟倫·費尔巴哈的家里。

巴伐利亞是當時勢力強大的德意志國家之一。巴伐利亞在工業方面是落後的，它特別頑強地保持着封建等級傳統。跟普魯士和其他許多德意志公國不同，它仍然信奉天主教。巴伐利亞公爵威廉第四就是以在1522年頒布了禁止在巴伐利亞宣傳路德教義的法令而“著名”的。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里安一世曾是著名的天主教同盟的首腦。1806年，巴伐利亞的選舉侯獲得了國王的稱號。這位國王竭力與普魯士競爭，指望同奧地利建立同盟來反對普魯士。1871年，普魯士和其他許多德意志公國都參加了德意志帝國，而巴伐利亞的統治階級却仍然敵視普魯士的統治，企圖執行獨立的反普魯士政策。這種情況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儘管巴伐利亞的君主政體也是反動的、反人民的。因為普魯士當時是德國好戰的容克地主階級的堡壘，因此任何抨擊“普魯士主義”的企圖都能夠促進反封建力量的增長，甚至當反對普魯士的人是其他德意志公國的封建主的時候也是如此。而巴伐利亞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先進階層的代表人物，便利用了巴

伐利亚和普魯士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來宣傳反中世紀思想。
哲學家的父親安瑟倫·費爾巴哈正是這樣的人。

安瑟倫·費爾巴哈並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革命任務，他站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上，實際上是支持舊的巴伐利亞國家的。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從抽象的法學觀點來批判巴伐利亞封建制度的專橫，主張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安瑟倫·費爾巴哈是一個典型的相信抽象的人類理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按照這位著名的巴伐利亞人道主義者的意見，人類理性應當“不用暴力”，而依靠舊有的法律在巴伐利亞的土地上建立“公正的”國家制度。

杰出的俄羅斯作家柯羅連科曾經回憶起他那在沙皇時代當法官的父親。他生動地描繪了他的父親，說他的父親是一個非常誠實的和規規矩矩的人，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說他的父親深信應當通過“大公無私地”利用沙皇的法律來向俄國的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費爾巴哈的父親也站在同樣的空想主義的立場上，他從自己的兒子路德維希的童年時代起就向後者灌輸抽象的啟蒙主義思想和同樣抽象的人道主義思想。安瑟倫·費爾巴哈的世界觀儘管具有這些局限性，但它仍然對後來這位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哲學觀點的形成，起了有益的影響。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從童年時代起對於諸侯的專橫就是懷有反感的。

費爾巴哈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也對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起了有益的影響。例如，他的哥哥安瑟倫專門研究美學問題，曾在藝術方面提出了許多進步的思想。他的另一個兄弟、數學

家卡尔曾公开反对巴伐利亚当局的专横，并因此遭到了迫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兄弟艾杜阿德·费尔巴哈关于法和国家问题的讲演中，也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倾向。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23年他19岁时进入了海得堡大学。费尔巴哈在这所大学里的学习更加增强了他的反封建思想。应当注意到海得堡大学是德国的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它建立于1386年。早在16世纪时，海得堡大学中的先进教授们就已经开始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803年，海得堡与巴登合并，企图重新恢复由于天主教的反动而暂时被人遗忘的人道主义传统。费尔巴哈在这所大学里学习时，满怀热情地继承了海得堡大学进步的教学传统，坚决反对那些盘据在这所古老大学里的反动的教授和教员。费尔巴哈研究神学文献的结果，始而对神学失望，继而成了神学的公开的反对者。

费尔巴哈一方面向封建等级传统进行思想斗争，另一方面，跟他的父亲安瑟伦一样，他又规避积极的政治斗争。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脱离政治”的状态下度过的。他宁愿过“安宁的”乡村生活，而不愿过在政治方面比较活跃的城市生活。费尔巴哈甚至没有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斗争，而当时德国的优秀儿女都认为积极向反动制度进行斗争乃是自己神圣的爱国职责。列宁在他著名的“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费尔巴哈不懂得1848年的革命。”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参加直接的革命斗争和他不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德国哲学家在

某种程度上是支持反动派的。他是站在革命方面而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尽管是以抽象的形式)。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这些讲演是他在1848年12月1日至1849年3月2日这段时期在海得堡应大学生们的请求而作的。

在第一讲中,他似乎是在批评自己的同时,公开地欢迎革命和尖锐的政治斗争。

他说:“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无需颁布一条法律,象古时雅典一样,规定每人每逢暴动时候都须加入某一党派;这个时代,无论何人,连自以为中立的人在內,都会不知不觉地归属于某一党派,即使仅仅是理論上地;这个时代,政治的兴趣盖过其他一切的兴趣,政治的事变不断地引起我们紧张和兴奋;这个时代,把一切政治以外的事情都忘記了去,这而且是一种义务,尤其对于我们这般非政治的德意志人,——因为就个人来说,他如果没有毅力在某个时候专心一志地进行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他就什么也做不成功,同样,人类也必須在某种时期为了一件使命忘記其他一切使命,为了一种活动忘記其他各种活动,倘使要想做出一些有功效有成績的事情的話。这次讲演的对象是宗教,宗教自然是同政治有極密切关联的;但是我們现今最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理論的政治,却在实践的政治。我们要直接参与政治,要以行动参与政治;我們已經沒有耐性和趣味来讀書、写字、講教和研習了;我們从童年并滿意于講論和著作,已經够久了;現在我們要求:語言終于变成血肉,精神終于变成物质;我們已經緊

足了政治的唯心論，就象壓足了哲學的唯心論一樣；我們現在要成為政治的唯物論者了。”^①

我們特意從費爾巴哈的講演中摘了這麼長的一段引文，因為它明顯地和獨特地說明了這位進步的德國哲學家對於從政治上改造當時的德國這個任務所抱的鮮明的肯定態度。在費爾巴哈的言論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肯定了政治問題的重大意義。他說，在直接進行革命起義的關頭，沒有任何一個公民能夠站在“無黨派的”立場上，人們甚至違背自己的意志而不得不積極地參加到鬥爭中去。費爾巴哈熱情地和生動地談到，今後決不能滿足於講論和著述，而必須使語言變成血肉。他號召要成為政治的唯物論者，這一點證明這位先進的思想家仿佛已經感覺到他所宣傳的哲學與政治鬥爭脫離的思想是站不住腳的。

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第一講的第二部分也是值得注意的，他在这里企圖為自己的避居鄉村作辯護。

他說：“以前那個時代使我不得不在我的內心中永遠放棄了學院的職業而搬到鄉下去住，那個時代是如此憂郁和沉悶的時代，以至使得我不會有那样的料想。在那個時代里，一切公眾的關係是如此布滿了毒質和疫苗，以至使得人們只有放棄一切官職，一切公務，甚至於一個講師的位置，才能夠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和健康；在那個時代里，一切官職的任命，一切政府的許可，甚至於講學的許可，也須拿政治上的奴顏婢膝

^① 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頁。

和宗教上的欺瞞詐騙為代價，才能取得到手；在那個時代里，唯有學理上的著作文字才是自由的，但也只有極高限制下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並非由於別人對學理的尊敬，寧可說只是由於別人對學理的輕蔑，——別人因為學理對公眾無影響或不關心（無論是實在的或推測的），就輕蔑了學理。那麼在那個時代里，尤其是一個自覺存有與統治的政治制度相違反的思想和意向的人，能有甚么事情好做呢，除了退隱到孤寂中去，並且使用著作文字作為唯一的手段，以便逃避——固然也要帶着安命和自制的態度——專制政府的無理壓迫？

“可是我之所以遁到孤寂中去，而專心從事文字著作，也並非僅僅由於政治上的厭惡。我不僅同那時代統治的政治制度處在不斷對立的地位，我而且同那時代統治的精神體系、即哲學和宗教的體系，也是分道而馳的。為了把這種分馳的對象和原因探究清楚，我必須得有各方面免受妨害而又持續不斷的閑暇。這種閑暇當于何處去討呢，倘使不是在鄉村，那里人們可以擺脫城市生活的一切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依靠、顧慮、虛榮、分心、狡詐和噁舌，而只管顧自己的事情？”①

遺憾的是，費爾巴哈對於自己沒有積極參與活動的辯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還在革命以前的時期里，德意志民族的先進兒女們就已經感覺到向反动制度進行政治鬥爭的時刻到來了。認為在鄉村里仿佛沒有特別不利于自由的哲學活動的

① 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商務印書館 1937 年版，第 3—4 頁。

障碍，这样的借口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封建的铁蹄下，德国的乡村比生活沸腾的城市更不利于进行理论工作。但是，甚至这位进步哲学家的这种不彻底的抽象的批评（确切些说，“自我批评”），以及他提出的把哲学活动同对思想上的与政治上的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的要求，特别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里，也曾经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遗憾的是，费尔巴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尽管是非常激进的，但他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良善的愿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全部哲学带有被动的直观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不能证明必须使哲学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世界观。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在1848—1849年的革命之后，费尔巴哈也仍旧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在向反动的封建思想、唯心主义和宗教进行斗争时，也仍旧首先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一事实主要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决不意味着他转而走上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的道路。

甚至费尔巴哈纯粹从理论上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矛盾的。起初，费尔巴哈打算成为一个神学家。他崇拜象施莱艾尔马赫^①那样的人。后来，费尔巴哈成了黑格尔的热烈的崇拜者。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决裂，

① 施莱艾尔马赫 (1768—1834年)，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原